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



唐书故事选

李道英 编著



学苑出版社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

唐书故事选

李道英 编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书故事选/李道英编著. - 2 版. -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6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

ISBN 7-5077-0055-0

I. 唐… II. 李… III. 历史故事-中国-现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02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永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36 开本 10 印张 180 千字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9.80 元

前 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向以汉、唐盛世并称。

唐王朝以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高祖李渊称帝于长安起,至开平元年(907 年)朱全忠废哀帝李柷建后梁止,传二十一帝,历时近二百九十年。其以鲸吞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兴国,又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涛中覆亡。它结束一个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动乱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动荡;最后,它又开始了一个为期半个世纪左右的纷争时代——五代十国的篡乱。探求其治乱兴衰的轨迹,评说其是非得失之功过,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许多沉痛的教训可供汲取。

由于隋炀帝的荒淫残暴,政治黑暗,终于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在起义军的有力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很快土崩瓦解,一部分地方势力从统治集团中分裂出来,加入了反对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行列。李渊及其儿子李世民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李渊是关、陇地主集团中的大贵族,史称其为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其祖父李虎,曾帮助宇文泰建立关中政权,死后追封为唐国公。其父李

昉袭爵，官至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七岁时袭爵唐国公，历任刺史、卫尉少卿等职，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出任太原留守。

当时山西的农民起义军势力颇大，李渊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看到了隋炀帝的腐朽统治再已无法维持下去，于是转而发展自己的实力，准备夺取政权。他命令长子李建成“潜结英俊”于河东(山西省永济县)，次子李世民“密招豪右”于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西)。李世民与隋晋阳宫副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结好，共谋起兵，李渊又派人与突厥通好，不惜向突厥称臣，以求其出兵相助。同时，李渊在太原也筹集了足够的粮饷。一切准备就绪，遂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起兵于太原，率三万之众，渡过黄河，进军关中。一路上，招降了部分农民起义军和战败的隋军，又汇合了一部分反隋的武装势力，聚众二十万人。当时关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击溃了隋朝的主力，李渊、李世民等乘虚一举攻占了长安。李渊奉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自为大丞相。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死，杨侑让位，李渊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唐。

李渊利用据有关中的有利条件，稳定了关中的形势，进而向四方发展。唐统治者利用分化和镇压两种手段，先后平息了关中的丘师利、何潘仁、唐弼，中原的李密，河北、山东的窦建德、刘黑闥，江淮的杜伏威、辅公柘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又进而消灭了金城的薛举、凉州的李轨、晋北的刘武周、洛阳的

王世充、两湖的萧铣等地方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其版图东到朝鲜半岛，西到中亚，北到蒙古，南到印度支那，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内附，使得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唐王朝的社会政治情况，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

唐朝的开国者是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得天下的。他们亲眼看到了隋朝统治者的覆灭，也亲自领教过农民起义的力量，他们建国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唐太宗君臣认真地总结了隋朝亡国的教训，深深地领悟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道理。为了能更有效地统治人民，而又不致遭“覆舟”之灾，唐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措施：

其一，完善国家机器，强化中央集权。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而有所变革：门下省主管议政，中书省掌管军国政令，尚书省掌管行政，执行各项政令，议政、决政、执政之权分别归三省，而总于皇帝；尚书省下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自主管一方面行政工作。此外，中央还设有监察机构——御史台，主管对各级官员的纠察弹劾之事。唐不仅改隋代郡、县制为州、县制，而且在州之上又设了“道”这一层行政机构，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加严密。在军权方面，全国共置六百多个折冲府，分别属于十六个“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为府兵的最高军事长官，而卫大将军又直接隶属于皇帝。这样，皇帝

就可以通过这一套完善的国家机器有效地控制着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其二,实行均田制。经过隋末的暴政和战乱,农业生产严重破坏,户口逃散,土地荒芜情况十分严重。为了发展生产,稳定国家收入,于是唐代又沿用并改进了隋代的均田制。每个成年男子、老年男子、寡妻妾、以及僧、尼、道士、女冠,皆可按规定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各级官吏亦按官职分给永业田、职分田和公廨田等。同时,官方还限制豪强无限制占有土地。尽管唐代的均田制非常不均,但毕竟使不少农民有地可耕,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其三,实行租庸调法。此法也是直承隋代而有所变化。租即田租,庸即劳役,调即户口税,即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男丁若不想按规定服劳役,可以“输庸代役”,即可以交绢或布来顶徭役。此外,朝廷还有按灾情轻重减免赋役的规定。这一套办法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然获得好处最大的是朝廷。

其四,实行府兵制。诸道折冲府是府兵制的基层单位,兵士的来源是农民。实际上,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男丁二十岁开始服兵役,六十岁老免。兵士轮流被征调服役,不服役即回家种地。府兵春夏秋三季农耕,冬闲进行军事训练。“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

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新唐书·兵志》）这种兵农合一的办法，既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使士兵训练有素，还避免了将帅长期握有重兵而飞扬跋扈。

其五，完善科举制。六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按门第选官，实际上是腐朽的官吏世袭制。唐承隋制，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常设的有明经和进士两科，而尤以进士科为时人所重。此外，还有明法（法律）、明书（书法）、明算（数学）等专科以及名目众多的“制科”（皇帝直接主持）。由于科举制的实施，就为一部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入仕开了方便之门，而且选用人才的大权也集中到了中央。唐统治者还通过重修《氏族制》和《姓氏录》，提高在唐朝做官的新贵们的门望，使他们升入士流，以此来抑制旧士族。科举制实施的结果，使出身寒门的才德之士步入官场，这对提高官吏素质，巩固各级政权和稳定知识分子队伍，都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唐统治者还进一步完善了法律，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唐统治者还大兴农田水利，推广先进技术。通过这一系列新措施的推行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央集权巩固了，社会矛盾缓解了，农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唐王朝很快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斗米只值三、四钱，终岁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全国各地百姓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贞观四年》），史称

“贞观之治”，足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

太宗之后，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参与朝政，开始了唐王朝宫廷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高宗死后，武则天先后废掉中宗、睿宗二帝，自己当上了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病重之机，带领群臣入宫，杀死了武则天的驸马张易之、张宗昌等人，恢复了中宗的帝位，但接着而来的是唐中宗的韦皇后弄权，迫害朝臣，又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动荡，最后毒死唐中宗，准备临朝称制。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韦皇后等人，唐睿宗恢复帝位。睿宗昏庸怯懦，太平公主又干预朝政，处心积虑要杀害太子李隆基。后睿宗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李隆基一举消灭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唐王朝的政权，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内乱之后，又开始安定下来。唐王朝最高统治层之间的权力之争是错综复杂而又惊心动魄的，但从全局来看，并没有严重妨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整个社会仍呈上升趋势。唐玄宗结束了最高统治层的内乱，唐王朝也开始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元之治”。

唐王朝经过百年的发展和社会积累，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唐玄宗本人经历了不少政治斗争，有一定经验，前期又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所用大臣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均为才德兼备的政治家，他们整顿吏治，广开言路，限制宦官和无能皇亲国戚掌权，不建寺观，不赏边功，使社会稳定发展，由于生产关系的较大幅度调整和各项具体政策的实

施,农民生活相对安定,户口大增,生产积极性也较高,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纺织、冶矿、造纸、陶瓷、制茶、制盐等工艺技术都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国内水陆交通也有了很大改善,促进了国内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诸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大的商业都会。随之而来的是对外贸易的大发展,西北由陆路通往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通过名闻世界的丝绸之路,将大量丝织品和各种工艺品运往国外;东南海上形成以广州为枢纽的贸易中心,吸引着东南亚各国以及波斯、阿拉伯各国的外商;在东方对新罗(朝鲜)、日本的贸易更为繁荣。由于内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每年都有极为可观的商业税收。因此,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新唐书·食货志》说:“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唐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六两为一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杜甫在其《忆昔》诗中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运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膝。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可以说是对开元盛世最形象、最生动的描述。

唐玄宗把唐代推向了繁荣的高峰,同时,他也导致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唐玄宗后期,骄奢之心日盛。他认为国家强盛,可以高枕无忧了。从开元后期起,他开始排挤忠良,信用奸佞,把朝政相继委托给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些人更是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特别是天宝年间唐玄宗得到杨贵妃之后,“从此君王不早朝”,终日沉溺于酒色享乐之中。宦官乘机和一部分朝臣勾结,参与朝政;玄宗依仗军事力量强大,穷兵黩武,不断进行扩边战争,武夫们为邀功请赏,更是随意挑起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一些矛盾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官僚、地主、寺院大量兼并土地,农民大批破产,均田制遭到破坏;随着均田制名存实亡,府兵制也不复存在,兵员严重不足,于是一些武将就改用“募兵”制,招募流亡农民当兵,甚至终生服兵役。边将长期握有重兵,割据的祸胎已经酿成,这样,就给唐王朝带来了重大的灾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日趋尖锐,唐王朝在繁荣景象背后,已潜伏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终于导致了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

野心家安禄山利用唐玄宗的昏庸纵欲,打着讨伐奸臣杨国忠的旗号,起兵范阳,占领洛阳,夺取长安称帝,唐玄宗仓皇幸蜀,唐王朝几乎亡国。后虽竭尽全力,又借用回纥兵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为期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元气大伤,兵革所到之处,满目萧然,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

振。

平定安史之乱以后，精疲力竭的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后期。这后期又可大体分为中唐和晚唐两个阶段：从唐代宗到唐敬宗，人们习惯称为中唐；文宗以后称晚唐。

中唐时期，由于平定了安史之乱，国家又大体归于统一。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再振国势，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唐代宗表示要整顿朝政；唐德宗时，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起用刘晏理财。刘晏是著名的理财专家，他主要运用两种方法：一是通过漕运将南粮北运，以应京畿急需，同时运用国家经济力量来调剂各地的物价，兼顾国家和百姓利益，在百姓可以承受的限度内，尽量为国库增加收入；二是通过改革盐税，为国家大开财源，使盐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支柱。刘晏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杨炎诬刘晏谋反，刘晏被杀。杨炎执政后，用“两税法”取代名存实亡的租庸调法，即将租赋和一切杂税合在一起，农民分夏秋两季以实物交纳。并规定：两税之外，不得另行苛征。此法实行之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也稍稍改善了国库收入。但不久，此法即被统治者所破坏。他们于两税正额之外，巧立名目勒索百姓，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两税法又废，农民苦不堪言。唐顺宗时，利用王伾、王叔文、柳宗元等推行“永贞革新”。他们内抑宦官，外制藩镇，惩办贪官，起用贤臣，罢除宫市，释放宫女，薄赋轻徭，实行了一系列好的政治措施，虽然

革新只持续了五个月就被保守势力镇压了,但却具有很大进步意义。唐宪宗上台,表示接受群臣建议,并且对藩镇采取了镇压措施,平定了淮西藩镇,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威望。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使社会大体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国家出现了一点复苏的苗头,因此历史上称之为唐代的“小中兴”时期。

然而,这种情况只是一种表象,有些甚至是假象。因为它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唐社会存在的一系列根本矛盾。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这对基本矛盾外,中唐的主要社会问题有四:一是宦官专权。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但他们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方便,力求讨得皇帝的欢心。唐玄宗后期,自己不理朝政,又不信任朝臣,而十分宠信宦官,高力士就是权势十分显赫的大宦官。由于宦官得宠,朝廷动辄赏钱、赏官,宦官占有相当多的财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李白《古风》二十四)。长安、洛阳城里的甲宅名园,郊区的上等好地,相当一部分属于宦官。一部分无行的朝臣勾结宦官谋私,于是宦官插手朝政;玄宗不信任武将,把御林军交给宦官指挥,并且给节度使派监军,而监军均由宦官出任。宦官还设立了“北司”(宦官的办事机构),与南司(朝臣的办事机构)分庭抗礼。由于宦官掌握了部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所以他们骄横跋扈,权在人主之上,立君、废君、弑君,如同儿戏。中唐以后的皇帝,绝大多数受宦官挟制,当然宦官们也就掌握了朝臣

们生杀予夺大权。

二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就是地方割据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握有重兵的节度使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不听中央的命令，自己征兵，自己征税，自己任命僚属，甚至搞父死子继的节度使世袭制，把自己的辖区搞成一个独立王国，而这些藩镇就成为控制地方一切权力的地头蛇。各个藩镇之间又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他们“喜则连横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经常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藩镇与朝廷的叛乱与反乱之战，藩镇之间为私利的互战，使中唐以后的唐王朝内部经常是兵连祸结，战乱不已，不仅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军事实力，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三是朝臣内部的党争。唐朝实行科举制，相当一部分官员由此进身，这些人被时人认为是“清流”，而他们又往往因是同乡、同年或师生关系而在政治上互相依存，互相提携，形成大大小小的集团。而唐朝又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是不参加科举考试，而靠“门荫”步入官场的。这些人往往凭着自己祖辈、父辈的权势和关系，很快就在社会上占据有利地位，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他们也通过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结成不同的集团。不但这两部分官员之间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党派，而且他们的内部也往往因利害不同而结成大大小小的帮派，进行着明争暗斗。除此之外，还有革新与保守之争。中唐时期国势衰弱，政治

腐败,矛盾重重。一部分身居要位的官僚,他们是腐败政局下的既得利益者,竭力要维持现状;而一部分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则为了振兴国家而极力主张实行社会改革,这就形成了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如唐顺宗时以王伾、王叔文为代表的永贞革新派与以大宦官、大官僚、大藩镇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激烈的、持续不断的内消耗,也大大削弱了其统治实力,对政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佛、道的盛行。由于唐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佛教、道教均成为国教。唐朝的多数皇帝,不是信道,就是佞佛,甚至是兼而信之。因此,佛、道二教在唐代都有了很大发展;广修寺观,僧、尼、道士、女冠数目多得惊人。尤其是佛教更是受青睐。玄奘从印度取回佛经后,唐太宗支持他翻译佛经,唐高宗修了大慈恩寺,武则天因曾出家感业寺,后又有和尚伪造《大云经》为其当皇帝大造了舆论,所以对佛教特别优待。唐中宗、唐睿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宪宗以及晚唐的皇帝,无不奉佛,动辄有大量赏赐。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又不交租服役,这样,不少游手好闲之徒加入佛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劳而食阶层。他们大量兼并土地,不仅直接危害农民和中小地主利益,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佛寺却拥有大量财富,以致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加剧了社

会的矛盾，而佛、道消极出世的思想 and 人生观，也对社会人心和社会风气起着不可忽视的销蚀和破坏作用，从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除此之外，由于唐王朝国力的衰弱，防御力量大大下降，所以边疆各少数民族当权者乘机内侵，唐王朝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被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

这种种矛盾的交错发展，使唐王朝的总体实力急速下降，江河日下的衰落趋势越来越严重化和表面化。进入晚唐，情况更加不妙，它不仅承袭了中唐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弊端，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对晚唐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宦官与朝臣的火并、牛李党争和唐末农民大起义。

唐宪宗、唐敬宗相继被宦官杀害，唐文宗又被宦官扶上了台。由于宦官权势太盛，于是唐文宗谋诛宦官。他先用宋申锡为宰相，图谋渐除宦官权势，因行事不密而失败。后又用李训、郑注，李、郑谎称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天降甘露，谋诱宦官随皇帝来看，伏兵围而杀之。但因露出马脚，为宦官识破，大宦官仇士良挟持了唐文宗，派禁兵杀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及重要朝臣，又大杀诸司从吏数百人，造成了京城流血千门的大惨案，史称“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宦官气焰更盛。至唐末，唐昭宗时，宰相崔胤谋诛宦官，勾结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外援；宦官则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贞茂与之相抗，结果朱全忠打败了李贞茂，宦官七百多人全部被杀。但同

时,朱全忠也就牢牢控制了唐昭宗。

朝臣党争至晚唐愈演愈烈,而影响最大的是以牛僧孺和李德裕各为一派的牛李党争。两派在政治上各有得失,但因政见不同、利害冲突而斗得你死我活。两党交替执政,而又互相攻讦争夺,持续数十年之久,使很多朝臣卷入其中,把朝政弄得一塌糊涂。

对唐王朝覆灭影响最直接的是阶级矛盾激化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朝政的腐败,社会矛盾的加剧,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不少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封建统治者日益繁重的赋役和各种苛捐杂税又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的《直谏书》充分反映了唐末的社会实况:“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潜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可以说,唐末之世,到处布满了干柴。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有揭竿而起。首先是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